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

丛书主编：王学俭

分裂与反分裂： 分裂主义研究论集

FENLIE YU FANFENLIE:
FENLIEZHUYI YANJIU LUNJI

杨 恕 李 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兰州大学‘985’建设项目资助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

| 丛书主编：王学俭

分裂与反分裂： 分裂主义研究论集

FENLIE YU FANFENLIE:
FENLIEZHUYI YANJIU LUNJI

杨 恕 李 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裂与反分裂：分裂主义研究论集 / 杨恕，李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161 - 4014 - 7

I. ①分… II. ①杨…②李… III. ①分裂主义－世界－文集
IV. ①D815. 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07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 晃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9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纵观人类历史，横看世界万象，不论有多少纷纭繁荣的理论学说，不管有多少百舸争流的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尽管时代发展波澜壮阔，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时代的旗帜；尽管人类历史风云变化，但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共产党宣言》发表 160 多年来，各国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先导和思想支撑，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总结和经验概括，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也是一个由科学理论指引向前、用科学理论助力发展的光辉事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是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事业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义不容辞的责任。100 多年来，一代代兰大人秉承“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精神，直面清贫、乐于奉献、淡泊名利、严谨治学，书写出百年兰大辉煌的历史篇章，

奠定了兰州大学百年厚重的人文底蕴。作为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重镇——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始基于 1950 年创建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和 1980 年创建的思想品德教研室。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目前已发展成为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两个一级学科，拥有马克思主义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三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七个硕士点、三个本科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实体。两大学科相互支撑、教学科研相互促进，奋进努力、活力迸发。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中，学院汇聚了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较为合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队伍；创作出了一批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的成果，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关系、中亚研究及西部民族地区治理与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等方面，形成一些有特色、有水平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兰州大学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学科建设，提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水平，经与兰州大学研究生院、兰州大学重点建设处、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协商，决定以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体，组织研究团队、搭建学术平台、攻关学术难题，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目前丛书已经出版了《政治理论新编》、《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要文献导读四十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典文献导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行政学概论》等著作。我们计划今后将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兰州大学出版社为依托，按一个主题、分两个系列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将这套丛书设定为研究性、开放性和学术性的丛书，让一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补充进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断展示学院在发展中的研究成果，凸显学院的研究特色，强化学院的学科建设，增进同行的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的发展创新，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春华秋实几十载，继往开来再攀登。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绝非一

朝一夕之事，它需要坚实的学术根基和连续的学术传承。我们今后将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按照“强化专业队伍、优化研究方向”的学科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狠抓落实，耆宿精诚合作、扶掖后学新秀，形成实力比较雄厚、特色比较鲜明的良好的学科体系和颇具潜力的发展态势。我们在学术莽原上辛勤拓垦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头脑，那就是时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始终明了自己的方位，从而奋发进取、砥砺前行，追求更高的目标。清代著名文士袁枚有言：“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我们努力团结和凝聚一个励志进学、有才有识的群体，在学术求索的道路上力争张弩飞矢，瞄准更高远的目标，不断“中鹄”、不断前进。

当然，我们也深深地认识到，与国内兄弟院校、同行同仁相比，我们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存在明显不足，如选题过泛、学术性和思想性不够统一、理论性和现实性关联不高、对问题的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研究方法有待改进、学科特色有待提炼、标志性成果有待加强等。但是，我们也坚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勇于探索、甘于寂寞、献身学术、自强不息，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实现更大跨越的发展。

我们既期待着同行专家学者的悉心指正，更盼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深知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在于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丛书”编审委员会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部分 分裂主义基本理论

分裂主义界定研究	(25)
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动因分析	(40)
论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57)
对基于自由民主角度的分裂权利理论的简评	(75)
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制度	(98)
评清朝的西藏政策	(111)

第二部分 分裂主义国际化研究

分裂主义与外部环境	(130)
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	(142)
“疆独”、“藏独”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162)
我国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及其引发的国际冲突研究	(182)
俄格冲突后的格鲁吉亚局势	(196)

第三部分 分裂主义案例研究

当代美国民族政策述评	(218)
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现状研究	(235)
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再思考	(258)
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作用的再评价	(267)

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	(276)
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与多党制下的政党民族化	(286)
猛虎组织溃败的原因分析	(299)
“后猛虎时代”斯里兰卡反分裂形势及民族关系分析	(316)

第四部分 其他相关理论问题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及相关理论探讨	(335)
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吗？ ——与叶自成先生商榷	(343)
周边国家自治制度评析	(356)

绪 论

本书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近年来关于分裂主义及反分裂研究中公开发表的部分成果，现结集成册，既是对中亚研究所分裂主义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便于学术界及读者加深对分裂主义的综合性理解。

从广义的范畴来看，民族分裂主义应该是民族冲突（广义的民族冲突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国家间的冲突）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类型。就国内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民族冲突相关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①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分裂主义的理论研究。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国际学界对民族冲突相关理论的研究，也算是作为加深对本书分裂主义相关理论研究理解的一个引子。

一 民族冲突理论引介

民族群体之间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反分裂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重视其中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驱动因素。关于国内民族冲突的诱发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学界主要从以下层面来展开分析。^②

^① 以此为主题的理论论著仅有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王剑峰：《多维视野中的族群冲突》，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等。

^② 从理论上研究分析民族冲突的产生及内在的机理是民族分裂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部分内容的引介，可详见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6—96 页；刘力、杨晓莉：《民族冲突的社会心理机制》，载《心理科学进展》2011 年第 6 期；卢凌宇：《国内冲突的起源：“怨恨”还是“机会”？》，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15 版；郑永年、单伟：《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载《东亚论文》2010 年第 77 期等文献。

(一) 不安全 (Insecurity)

民族群体对安全威胁及自身安全状况的判断，是影响民族关系的基础性变量。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主要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理论来解释民族冲突现象。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Waltz) 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为了自保而不断扩展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以增进自身的安全。^①但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使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从而导致安全困境。

1993年，巴里·波森 (Barry Posen) 将安全困境理论运用到民族冲突的解释中。他认为，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相类似，在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解体后，也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他指出，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两种状况将可能提升民族群体对安全困境的感知：一是民族的“群体化”(groupness)，使民族无论是基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目的都可以轻易地进行武装动员。此时的民族群体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权国家相类似，由于不能直接确认对方的意图，所以它们将透过历史的透镜判断对方的行动。而两族间历史上的矛盾和冲突将直接影响这种判断。二是民族的“地缘政治学”：如果某一民族处于地缘性孤立或易受攻击的地缘位置中，它们的不安全感将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采取某些防卫性措施，但是这可能被其他民族视作进攻性行为。^②

芭芭拉·F. 沃尔特 (Barbara F. Walter) 进一步指出了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民族间恐惧环境滋生的条件：(1) 政府垮台或国家解体（如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车臣、南斯拉夫、克什米尔、民主刚果）；(2) 地缘孤立或易受攻击（如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卡地区、波黑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3) 政治或人口实力平衡的改变（如黎巴嫩、南斯拉夫、苏联、卢旺达、布隆迪、斯里兰卡、亚齐）；(4) 经济、军事资源的再分配（南斯拉夫）；(5) 被迫或主动放

^① Waltz, K.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② Posen, B.,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2), 1993, pp. 27—47.

弃武装（北爱尔兰、卢旺达）。^①当然，外部势力的介入也可能直接导致民族间关系的变化及民族实力对比的变动。

大卫·雷克（David Lake）和唐纳德·罗斯查尔德（Donald Rothchild）主要研究了安全困境在民族冲突升级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指出，民族成员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导致了双重困境：（1）信息失灵（民族间不能获取到有利于协调双方诉求的准确信息，而且各自也有意散布自身意图和能力的虚假信息）；（2）信任委托问题，即一个民族不可能充分保证它在将来实力平衡转变后不会背叛协议。这两种情形都导致了民族间的安全困境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都有首先使用武力、先发制人的动机。此外，民族间的安全困境还可能由于民族主义分子及民族组织的活动而恶化。他们通过制造和强化各种恐惧气氛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②

费伦（Fearon）进一步分析了信任承诺与民族冲突的关系模式。他认为，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中，一个民族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又至少存在一个与支配民族具有同样或相似力量的民族时，问题就会产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有力量的民族通常不会等待支配民族对它的信任承诺，反而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和地位会立即通过暴力冲突的行动寻求独立。而战争一旦爆发，就很难解决，因为双方都不会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放下武器，相互信任的缺乏将维持长久的敌意与对立。^③同样，温加斯特（Weingast）也认为，在缺乏信任、相互敌对的情形下，民族个体及其领导人都会认识到如果放下武器，就有可能成为对手灭绝的对象，在族际信任没有建立之前，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实力，实力能够确立自信、保障安全，甚至成为民族谈判的资本。民族冲突在实现一个时期的停火之后往往战火再燃，这与缺乏信任、质疑承诺有关。^④

此外，芭芭拉·F. 沃尔特指出，民族间的暴力主要是由相互指责对

^① Barbara F. Walter, "Introduction", in Barbara F. Walter and J.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2.

^② Lake, D., and Rothchild, 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2), 1996, pp. 41—75.

^③ James D. Fearon,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y Countr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 (2), June 2003.

^④ B. Weingast, "Constructing Tru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Ethnic and Regional Conflict", V. Haufler, K. Soltan, E. Uslaner, ed.,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方肆无忌惮和掠夺成性的领导者触发的。^① 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等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国家内部的安全困境不仅仅是战略地位，而且是社会地位的产物。^② 同时，温加斯特等学者提出了民族冲突过程中精英和大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试图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希冀和平的民众参与了民族间的流血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精英创建了不断增长的受害者风险的感知，且不断对民众进行煽动。^③

（二）怨恨（Grievance）

“怨恨”说则认为，群体之间产生冲突，主要是因为某一个或几个群体在该国的政治体制或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引来整个群体的不满。这是关于群体暴力最经典的一个解释。

从民族冲突的角度来看，怨恨的来源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族群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仇恨，例如，在波斯尼亚发生的种族屠杀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仇恨造成的；二是当前族群间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就现实来看，后者引发民族冲突的作用更大。它所涉及的是现实主义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最核心的在于民族间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怨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上的挫折—攻击机制（frustration-aggression mechanism），格尔（Gurr）是怨恨说的创始者。在格尔看来，国内冲突的根源是个人的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或者说个人所觉察到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格尔在 *Minorities At Risk* 一书中，指出其所研究的 233 个族群，均深受歧视之苦；而在 1945—1989 年间，有 200 个族群曾经有集体的政治行为，为了捍卫其族群利益而与政府或其他族群

^① Barbara F. Walter, “Introduction”, in Barbara F. Walter and J.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12.

^② Laitin, D., “Somalia: Civil War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 B. Walter and J.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6—180; de Figuero, R. J. P., and Weingast, B. R., “The Rationality of Fear: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 Walter and J.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1—302.

^③ de Figuero, R. J. P., and Weingast, B. R., “The Rationality of Fear: Political Opportunism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 Walter and J. Snyder eds., *Civil Wars, Insecurit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1—302.

相抗争，并且至少有 80 个案例升高到了内战的严重程度。^①

相对被剥夺感会强化某种身份，而蒂利（Tilly）则指出，身份对于武装动员是不可或缺的。这里的“身份”可能是共同的语言、历史、种族或者宗教信仰。格尔认为，身份一旦受到威胁，暴力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因此，相对被剥夺感越强，冲突的概率就越高，冲突的强度也就越高。

（三）贪婪（Greed）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开始扩展了民族冲突研究中传统的怨恨（不安全、不平等）的藩篱认为，经济的动机要超出原来的假设。

保罗·科林尔（Paul Collier）和安科·霍夫勒（Anke Hoeffler）认为，反叛运动有两个相互排斥的目标，控制国家或寻求分裂。他们指出，反叛运动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机会成本；一个是受益。理性行为者会计算暴力的收益和成本。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比如通过抢劫敌对族群的财物获得收益时，或者抢得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时，暴动才会成为可能。^② 他们发现：在低收入国家，内战是一个绝对现象（这些国家中参加反叛的机会成本低）；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会恶化形势（受益的诱惑）；国家的人口越多，冲突的可能性越大，且持续的时间越长（还很可能面临分裂主义的威胁）。朗德·里根 *Londregan* 及普尔（Poole）根据 1950—1982 年间 121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发现，在人均所得最低的国家群中，其政变发生的频率是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群的 21 倍。^③ 费伦（Feraron）等学者研究也显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往往也是族群冲突与内战发生几率较高的国家。^④

与贪婪理论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机会”理论。而且学者们认为，机会相对于动机而言，对民族冲突的发生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而把握“机会”的主体，则是民族精英势力。不满或抱怨只是政治暴力的必要条

^① Gurr, Ted 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②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 2000.

^③ Londregan, John B. and Keith T. Poole, “Poverty, the Coup Trap, and the Seizure of Executive Power”, *World Politics* 42 (2): 1990, pp. 151—183.

^④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1): 2003, pp. 75—90.

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不满必须被煽动和动员，才会转化为行动，这时候就需要政治精英的作用。族群的政治精英集团会操纵族群认同和怨恨情绪去寻求政治利益，会有意夸大与其他族群的矛盾，挑动族群间冲突。^① 在民族冲突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对民族群体特别是其精英势力而言，机会是多方面的。

首先，一个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研究发现，处于专制—民主光谱中段的国家，或者正处于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可能爆发群体冲突。^② 在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在政府强制力与控制力趋弱的同时，政治开放却使野心人士有机会可以诉诸族群议题并强力动员群众，因此族群冲突往往一发不可收拾。^③

其次，一个地区的族群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变量。研究发现，两极化的族群结构比碎片化的结构更有利于冲突，也就是说，有两个主要族群的社会比有许多小族群的社会更可能孕育强烈的族群间仇恨。^④ 有一个主体民族和一个大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最容易发生族群冲突。在有众多分散的人数较少的族群的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动员的可能性比较小。

最后，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也会对族群冲突有所影响。保罗·科林尔和安科·霍夫勒将1965—1999年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认为非洲国家中冲突之所以会有升高的趋势，是因为其经济成就——不论是收入水平、增长率或是经济结构的完善——非常贫乏。^⑤ 而推究经济因

^① Shultz, R. H., "State Disinte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41: 1995, p. 78.

^② Hegre, Harvard, et al.,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Opportunity, Grievanc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Workshop on "Civil Conflicts, Crime, and Viol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1999.

^③ Dudley, Ryan and Ross A. Miller, "Group Rebellion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 (1): 1998, pp. 7—96; Hegre, Havard,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 Gleditsch,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1): 2001, pp. 33—48; Muller, Edward N., "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1): 1985, pp. 47—61, Snyder, Jack and Edward Mansfield,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1995, pp. 5—38.

^④ Reynal-Querol, M., "Ethnicity, Political System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1.

^⑤ Collier, Paul and A. Hoeffer, "On the Incidence of Civil War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 (1): 2002, pp. 13—28.

素与控制族群冲突的因果关系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条件，关乎执政当局所能掌握的行政与经济资源的多寡，从而决定政府是否在平时能够满足各族群需求，而在危急时刻也有紧急应变的能力。^①

尽管“怨恨说”和“机会说”各自都面临着一定的解释力质疑，但二者结合起来，却表现出较强的解释能力。对内战爆发这一问题领域而言，怨恨与机会是相互支持的。具体而言，任何个体对所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怨恨，但机会为怨恨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广义而言，怨恨源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机会则使潜在叛乱者相信，通过暴力纠正这种不公正是有利可图的。简而言之，机会就是选择性激励。一旦大量的潜在叛乱者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②

(四) 社会心理动机 (Social-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民族心理本质论与民族冲突。尽管很多研究集中于探讨群体认同是群际冲突发生的基石，但是影响群体认同的最根本因素又是什么呢？近些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社会类别的心理本质论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概念，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群体认同的发生机制。心理本质论是指普通人关于许多社会类别具有“本质”特征的信念。^③ 如果人们将民族表征为具有“本质”特征，则认为民族的划分依据其先赋性，完全不可改变，民族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类别内成员具有同质性，且与外群体成员具有本质的不同。研究发现，民族、种族、性别和生理残障等是高度本质化的社会类别，而兴趣、政治理念、外表和社会阶层是最低本质化的社

^① Auvinen, Juha, “Political Conflic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81—198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4 (2): 1997, pp. 177—195; Ellingsen, Tanja, “Colorful Community or Ethnic Witches’ Brew? Multiethnicity and Domestic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 (2): 2000, pp. 228—249; Harff, Barbara,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1): 2003, pp. 57—73.

^② 卢凌宇：《国内冲突的起源：“怨恨”还是“机会”？》，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15 版。

^③ Medin, D. L., & Ortony, A.,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In S. Vosniadou & A. Ortony Eds., *Similarity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9—195; Haslam, N., Rothschild, L., & Ernst, D.,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 2000, pp. 113—127.

会类别。^① 关于心理本质论的社会影响方面，有研究认为，多数成员关于性别、种族等社会类别的心理本质论越强，越倾向于对外群体成员进行特质性归因，^② 认为外群体成员和他们的人格差异性更大；^③ 当人们的判断与外群体不同时，也不愿意纠正其判断，^④ 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的支持^⑤ 和偏见^⑥也越强。此外，社会威胁情境可以引起民族的心理本质论的提升，进而加强民族冲突的参与意向。^⑦

偏见、歧视与民族冲突。有学者指出，从心理学来说，民族特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族际对比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机制，并通过它们形成另一个民族形态。在这方面民族特点差异常常被夸大。各民族间交往实践越少，就越有可能曲解别的民族的形态，由此构成意外的，常常是漫画式的特征。在制定行为准则时常常有夸大民族间差别而缩小民族内部差别的倾向。当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产生民族冲突时，敌视和偏见会长期保存在现行的民族行为准则中，而民族偏见则可能会导致民族冲突。^⑧

从理论上看，偏见是族群敌视的态度维度，偏见是针对族群的类型化的、稳定的和负面的态度，并以某种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过分简单化和夸张的群体性形象为基础。歧视是族群敌视的行动维度，它包含了意在维持族

^① Rothschild, L., & Ernst, D.,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 2000, pp. 113—127.

^② Prentice, D. A., & Miller, D. T.,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of human categ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007, pp. 202—206.

^③ No, S., Hong, Y. Y., Liao, H. Y., Lee, K., Wood, D., Chao, M. M., "Lay theory of race affects and moderates Asian Americans' responses toward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2008, pp. 991—100.

^④ Prentice, D. A., & Miller, D. T., "Essentializing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2006, pp. 129—135.

^⑤ Bastian, B., & Haslam, N.,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stereotype endorse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 2006, pp. 228—235; Bastian, B., & Haslam, N., "Im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sts and immigrants: Roles of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social identit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 2008, pp. 27—140.

^⑥ Keller, J., "In genes we trust: The biological component of 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chanisms of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2005, pp. 686—702.

^⑦ 刘力、杨晓莉：《民族冲突的社会心理机制》，载《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6期。另：关于民族心理本质论的外文原文均转引自该文。

^⑧ [苏]杰缅季叶夫：《论民族冲突心理》，载《共产党人》（苏联）1990年第1期。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5期。

群不平等的各种行动。歧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体的，另外一种是制度上的。前者通常是由单独的个人或小群体以蓄意的方式实现，后者是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的规范和结构的结果。解释偏见和歧视的起源与模式的理论传统主要有三个：一是心理学理论关注的是群体敌视满足特定人格需求的方式，该理论认为偏见和歧视应该追溯到个人因素；二是规范理论认为族群敌对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顺从反应；三是权力冲突理论把偏见和歧视看成是群体利益的产物，并被作为保护和增进这些利益的工具。该理论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甚至是当前的群体之上，而是放在了群体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竞争的动力学上。^①

斯图尔特·J. 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认为，民族冲突根源于民族间价值和认同的争夺。他提出了民族冲突的三个前提：必须存在民族间敌意的神话；某一民族有着自身存在受到威胁的恐惧；民族群体需要动员的机会。^② 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民族情感和民族价值问题两方面来分析。民族情感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且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和心理自卫特性越强，民族情感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就越鲜明。在民族心理中，这种无意识的作用机制威力很大。它能积聚引发其他冲突并使之变为民族问题的能量。^③ 从民族冲突的社会心理动机来看，对本民族地位的忧虑是造成民族恶性竞争乃至民族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为了获得群体权利或尊重，群体成员往往组织起来并付诸行动。民族价值问题容易成为政治问题。因为民族为了合法性、承认和地位而抗争，通常会视其他民族为对手和障碍。民族文化灭绝的恐惧会因实际冲突所产生的安全恐惧而强化。^④ 当然，在民族竞争关系或民族冲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存续到底是动因还是民族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这是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的。

^① [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0页。

^② Kaufman, S. J., *Modern Hatred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苏]杰缅季叶夫：《论民族冲突心理》，载《共产党人》（苏联）1990年第1期。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5期。

^④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76.